

■ 生活质量问题

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发展及其研究

周长城, 蔡静诚

(武汉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周长城(1957-), 男, 湖北荆门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武汉大学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 经济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研究; 蔡静诚(1980-),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生, 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

[摘 要] 生活质量主要体现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包含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体验与满意度的主面指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 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生活质量主观指标起源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 并在 80 年代以后逐渐趋于成熟。一些国际组织都采用了主观指标或建立了自己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作为主观指标发源地的美国, 在其研究与应用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欧洲一些国家紧随其后, 亚洲也开始了对人全面关怀的步伐。

[关键词] 生活质量; 主观生活质量指标; 国际水平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5-0582-06

主观生活质量, 也称之为可感生活质量, 即为实际生活的人们所感觉到的或所承担的生活质量, 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盛行于美国, 也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研究生活质量的学者所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讲, 国际学术界对生活质量(QOL)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主观方面, 并以个人的幸福作为研究的中心或出发点。在这一领域中, 一般把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民需要的社会看成是人们所追求的社会。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路使得研究者把对生活的满意度当成研究的基本概念。同时, 也有学者用个人的幸福感来解释和衡量生活质量。相对于包含着情绪、情感体验的幸福程度而言, 满意程度包含的是判断的或认知的体验, 它是对原来的期望水平和达到目标之间的差异的知觉。两者都把生活质量界定为对生活总体或生活各个具体方面的评价和总结, 这种评价和总结是从人们对生活的各个层面认识和感受出发的。

定义生活质量有三种主要的哲学方法: 首先, 生活质量应建立在宗教、哲学和其他系统上, 遵从宗教信仰和道德行为规范; 其次, 生活质量应建立在对所需生活的满意之上, 它假定人们会选择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式, 而能否获得他们想要的物质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再次, 生活质量来自于个人经验, 这种定义直接关联到行为科学的主观测量, 重视个人的体验, 如快乐、满意等。这与边沁的传统功利主义思想不谋而合, 即认为快乐与痛苦是人类两个最崇高的主题, 而社会就是要寻求最广泛人群的最大幸福。这也为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奠定了哲学基础。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 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 生活富裕并不等于幸福。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只是人们福利的一个方面, 并非意味着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所改善, 往往在一些虚假繁荣的客观数字背后, 常常隐藏着人们较大的不满情绪。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社会,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传

统发展模式已不再令人满意,人们开始对各种社会弊端以及造成的一系列无法克服的问题进行全面反思,认为这一战略对人们的其他社会生活和福利方面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于是,一场认为经济的发展不能代替社会的、科技的、政治的、家庭的和个人发展的社会指标运动应运而生。社会指标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社会发展不单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经济、科技、社会和人的全面、综合及协调的发展过程。这就是社会全面的、多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主要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均衡以及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氛围下,主观生活质量研究逐渐展开。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包含了个人对生活的主观体验,它的基本假设是生活质量可以根据人们的主观意识对快乐感和满意度的认识来决定。这个领域包括了对个人生活质量的理解,适合直接对个人主观感受进行测试并测定其个人 QOL 水平。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者对生活质量的评估研究,始终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全面、多元的需要作为基点,着重了解人们用什么标准来评估他们的生活质量,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期望水平以及与现实的差异。

从个人层面来看,坎贝尔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生活质量与个人生理需求的相关度为 0.13,与收入相关度为 0.12,与健康相关度为 0.10,与智力相关度为 0.17。显然,生活质量与客观物质资源低度相关。其低相关度可能基于以下因素:第一,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有极大的适应性,即使发生了重大的生活事件,如中彩票或受创伤都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短暂的影响;第二,对生活质量的影響不仅来自于外部生活环境,还来自稳定的个人性格倾向。比如,同样面对半杯水,悲观的人会说“可惜啊,只剩下半杯水了”,乐观的人会说“太好了,还有半杯水呢”。相同的客观环境在不同性格倾向的人看来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一研究结果论证了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不仅不容忽视,而且是真正实现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关键。

从社会层面来看,主观指标的主要优点是它们抓住了那些对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体验和经历。它主要关注回答者自身内在的对幸福与生活满意度的评价,而不是政策决策者或研究者认为是重要的东西。主观指标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政府部门正确决策,制定良好的生活质量发展战略。对于生活质量主观指标与公共政策的关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 社会政策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包括精神方面,这些实际的主观目标需要主观指标指导;2. 物质目标的成就很难被客观评价,相对于几乎没有意义的统计数字,主观测量往往更好;3. 通常客观指标使公共政策制定者很少能了解到公众意图,因为政策制定过程很少反映公众意图,所以政策决策者需要从民意测验中获取额外信息;4. 政策决策者必须要分清公众的需要与必须,必须是隐性的,但它使人们长久地从物质中获取幸福。

一、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的演进

(一)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早期研究

早在 1927 年,威廉·奥格博就对生活质量研究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他的领导下,胡佛研究中心 1933 年发表了《近期美国社会动向》专著,专门讨论和报道美国生活各方面的动向,在以后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奥格博的学生在“社会动向”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著。这类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两大主流:社会指标的研究和生活质量的研究。1957 年古瑞等联合几所院校进行全国抽样调查,主要研究美国民众的精神健康和幸福感。1958 年,美国经济学者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生活质量概念,他因此被看做生活质量概念及其研究的始作俑者。加尔布雷斯认为,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在生活舒适、便利程度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或乐趣。这里所指的生活质量概念已经明显偏向主观领域。美国在 1960 年发表的“总统委员会国民计划报告”中提出了“生活质量”这一术语。而这一术语的正式提出是在鲍尔等人于 1966 年发表的有关美国社会第二次实施的全国规划的文献中。生活质量概念的正式提出作为一种推动力,促使生活质量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鲍尔也因此被认为是生活质量研究领域的先驱,他在 1966 年主编了《社会指标》论文集,着重研究国家空间计划对美国社会的间接影响。1968 年摩尔和谢尔登发表了有关美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专著《社会变迁的指标》。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生活质量研究领域的成熟期。60 年代以后, 研究内容转向更为宽广的领域, 既有情感、心理健康的研究, 也包括对认知层次满意程度的研究, 而后者的研究占上风。生活质量主观指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广泛建立。

(二) 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广泛建立

1965 年坎特尔推出“坎特尔自我定级量表”。与此同时, 若曼·本拉德本也在一项全国民意调查中研究了国家民众的幸福感。许多研究表明, 在多数情况下, 专门性的情感指标可组合起来预测或者测量总体性的情感。米尔伯拉斯和沙尔 1974 年对人们生活环境的感觉度量是这类研究中最早的例子。这一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关感觉度量的问题。例如, 哪种潜在的性格正在被测量以及这种性格能否被测量出来? 还有无其他可以测量的对象? 对感觉重复测量得到的相同结果是否可靠?

1976 年, 芝加哥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坎贝尔和康弗斯曾就此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生活满意度模型即 Cs—Cd 等级模型。在这个模型中, 任给定一方面(如工作), 个体所处的客观环境(即有关工作的一系列客观条件)是他对这方面知觉的一种因素, 但由于个体的特点不同, 知觉形成的结果与客观环境可能很不相同。个体把知觉到的情境与个体的参照标准联系起来, 从而决定了他对这一方面的评估, 即属于下列答案的某一种情况: 很满意、较满意、无所谓、不太满意、很不满意。给这 5 个答案分别赋值 0、1、2、3、4, 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回答, 分别对应各个不同的值, 求其均值从而得出大众对这一方面的生活满意程度。坎贝尔等人于 1976 年还曾提出一项测量总体感觉的调查问卷表。主要内容是由当前常用的几组表明人们生活特征的对应该词汇构成, 如: 厌倦—有兴趣; 悲伤—愉快的; 困难—容易等。基于这些项目得出的刻度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对测量总体幸福和总体满足具有较高的关联性。

(三) 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的深入, 1978 年麦克纳尔较早开始了关于主观指标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方面研究。约斯科也在 1978 年引进并使用了离散结构模式分析方法研究主观指标。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指标选择方法论问题, 即有关确定一系列潜在特征的相对和绝对指标等问题, 仍是生活质量研究中正在探索的对象。琼斯和彼尔思在 1977 年提出, 由于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幸福概念是不同的, 如果要对特定活动的幸福程度加以公正地度量, 那么可以借助于分析行为中的时间消费, 把各种测量刻度统一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指数。与此类似, 朱斯特等人于 1981 年也提出了一个生活质量指数, 被称之为“幸福过程指数”。这是将各种基于时间分配而将人的兴趣加以抽象所得出的行为刻度, 既可以记载人们各种行为在时间消费需求上所反映的实际上不满足程度, 也同时可以看得出人们各种行为中所达到的幸福标记。

1995 年菲勒博士建立了四维模式结构: 即身体健康状况(各种生理功能活动有无限制, 休息与睡眠是否正常, 肢体是否残废或缺陷等); 心理健康状况(智力水平, 各种正向和负向心理活动, 情绪, 紧张程度等); 社会健康状况(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情况, 家庭关系, 爱情婚姻, 职业, 社会地位等); 精神健康状况(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宗教信仰, 精神文化生活等)。

二、国际组织关于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研究

联合国在 1974 年建立有关生育、家庭变迁、人口迁移、死亡等一整套如何发展社会和人口的协调性和联系性结构的指标体系, 即《社会人口统计指标体系》(SSDS)。其实, 这是一套不规范的社会指标体系, 因为它没有采用主观指标, 整个体系无法评价社会效果。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社会关注清单”, 因为运用了大量的主观指标, 为更多人所接受。“生活质量”和“福利”有时是可以互相使用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更倾向于用“福利”而不用“生活质量”, 只是因为它“与其他专门学科较少牵连”。经合组织试图在这个领域中建立一致的专门术语并加以扩充, 将一群个体福利的集合命名为“社会的福利”, 从而运用“社会福利”这一概念来评价社会的各项制度。

1994 年 2 月, 世界卫生组织(WHO)生活质量研究组在比利时召开了“国际生活质量协会”成立大

会,并概括了生活质量领域的6个主要研究方向。1995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帕特托等教授的倡导下,成立了国际生活质量研究协会,出版了《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会刊,许多国家都开展了生活质量相关的研究,同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举行了第一次学术交流大会。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生活质量的定义为多数人接受:即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以及所关心的事情和有关的生存状况的体验。WHO也对生活质量内容作了界定:即身体机能、心理状况、独立能力、社会关系、生活环境、宗教信仰与精神寄托。这也是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关于主观指标的研究。WHO关于生活质量主观指标比较著名的成果是WHOQOL-100和WHO-BREF。WHOQOL-100和WHO-BREF是世界卫生组织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研制的跨国家、跨文化并适用于一般人群的量表。WHOQOL-100有100个条目,含6个大项24个小项及一个总的健康状况小项。每个小项由4个条目构成,分别从强度、频度、能力、评价四个方面反映同一特质。WHOQOL-BREF保留了量表的全面性,仅含26个问题条目。它的各大项得分能代替WHOQOL-100,为测量生活质量提供了一种方便的、快捷的工具。

三、不同地区关于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研究

(一)美国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

美国盛行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认为生活质量应该超越宏观经济层面,考察每个个体对其生活是如何感受的。事实上,国际上研究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学者大多来自美国,对生活质量的 subjective 方面研究做了大量的奠基工作,为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美国学者研究表明,主观生活质量包括个人积极的和消极的经历和影响,与传统的精神卫生相比,主观生活质量并不仅仅强调某种负面经验的缺乏,较高的生活质量也应包括正面的积极的体验,生活满意度和生活中的主流,如工作与休息。因为一个个体或社会可能在主观生活质量的某一方面分值较高而在其它方面分值较低,所以,所有的因素都必须被评估。在经济领域,消费者的选择即在于对个人消费行为的测量研究而不仅是专家的判断。在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上,意图与消费行为的研究类似,即人们如何选择对他们的生活状态与生活事件的体验做出反应。就如一个经济学家判断一个工作的质量是通过人们对这个工作的选择和其它工作的比较作出的;主观生活质量研究者判断一个工作的质量是通过这个工作给从业者的幸福感、痛苦感和职业满意度来评估。

美国学者认为目标与资源是生活质量的两大关键。每个人都会在现有资源下追寻他们的生活目标,如果他们的目标与资源成正比,则生活质量较高(Diener, 1995)。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参照群体而非物资,跟谁比决定了一个人主观生活质量的高低。比如,一个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在寝室里,如果跟一个家境贫穷的同学作比较,主观生活质量就较高,而跟一个富翁的孩子对比,主观生活质量自然较低。尽管在生活中人们必须处处与他人比较,但人们往往会主动选择有益于自己的参照体。广泛研究表明,一个社会能否充分提供个体所需要的并给与个体实现人生目标的机会决定了社会的生活质量。举个例子,如果说收入意味着人们实现目标的必需,那么人权和平等则反映了个体能否获取自由与机会以在一个社会实现他们的目标。因此,一个社会仅有广泛地收入增长并不意味着该社会生活的质量高。而所有这些因素,在建立主观指标体系中都应该被考虑。此外,他们还发现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与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有关,如日本将谦逊列入主观指标。总之,主观生活质量更像是这样一种体验,即人们在一直朝向基于他们自身价值观所建立的生活目标所指引的那条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感觉。

为主观生活质量理论不断进行丰富的是大量的实证研究。美国学者研究生活质量大多以测量主观感受为主,如戴完全从满意度的角度对美国生活中的14个领域进行主观测量,即:对生活总的看法;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与工作有关的生活领域;个人健康;娱乐;精神生活;自我;健康;物品与服务的购买以及消费;物质拥有;联邦政府的工作表现;当地政府的工作表现等。还有Schwartz基于价值范畴建立的

主观指标体系,即控制感,包括成功、能力、雄心;情感的和谐,包括享受生命、愉悦感、有活力;智慧的和谐,包括好奇心、心胸宽广、有创造力;平等的保证,包括公平、社会正义、自由;协调,包括环境保护、美丽的世界、文化的同一;保守性倾向,包括社会秩序、自律、家庭保障;等级制度,包括财富、社会权利、权利机构。

(二) 欧洲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

欧洲的生活质量研究较美国起步晚,主要是德国、奥地利、荷兰、瑞士等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在欧洲,生活质量被认为是客观生活状况和主观幸福的集合。QOL 主观指标对特定方面的生活状况的评价和对整体福利状况的评价被纳入这些国家的生活质量指标系统之中。荷兰是欧洲第一个使用主观指标系统的国家。自 1974 年起,荷兰每隔 3 年就对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调查。在 1996 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该国列出休闲、社会参与、居住环境、健康、社会关系、满意度、工作生活条件等项指标,而且所有的指标又都依据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而有所差异。德国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建立 SPES 指标系统,并于 1977 年发布了第一份报告。该系统既可用主观指标测量福利感受,也可用以分析福利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

随着欧盟一体化的进程,欧盟建立起自己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其中涉及 13 个生活领域,有 185 个次级指标。其中客观指标占 85.9%,主观指标占 14.1%。虽然该体系主观指标所占比例不大,但证明作为长期具有客观指标倾向的欧洲也开始注重全面地、真实地反映生活,更多地尝试主观指标。

(三) 亚洲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

亚洲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尽管起步较晚,东南亚各国的学者和非政府部门也开始从事生活质量个体层面的主观幸福感和满意度的研究。泰国学者 Leelakulthanit (1990) 在泰国的曼谷地区进行了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就有关生活质量 13 个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标准式的问卷访谈,包括:家庭、工作状况、社会生活、娱乐、个人健康、健康保险物品与服务的购买与消费、物质拥有、自我、精神生活、泰国生活、泰国政府、曼谷政府。2001 年 Leelakulthanit 对 9 年前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调查,目的在于考察经过近 10 年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特别是经过亚洲金融危机后,泰国人的主观生活质量状态如何。Leelakulthanit 的研究虽然规模不大,但迈出了主观生活质量研究的坚实一步。

菲律宾的社会气象站 (Social Weather Station) 是一个从事社会发展指标研究的机构。他们长期对生活质量的维度进行跟踪调查。内容包括:自我评价贫苦状态和饥饿情况、关于生活质量的变化、对生活质量的预期、对国家经济的预期、对现任总统的满意度、对目前民主的满意度、对言论自由的满意度和对政治效率的满意度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 Kau 于 1994 年对新加坡国民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而研究新加坡的主观生活质量。调查领域包括:家庭、个人健康、工作状况、生活环境、物质财富、自我发展、社会生活、大众传媒、休闲生活、学校生活、物品的购买与消费、健康服务设施、生活在新加坡等。从这些学者的努力可以看出,虽然才刚刚起步,亚洲的生活质量研究随着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东亚的崛起,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主观指标方面。

总之,坚持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的学者普遍使用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强调用“心理学人”以区分“经济学人”,认为自我与社会的细节就是这个社会进程的全貌。这样就使他们的研究始终围绕着以人为本的思想,真正将每个社会个体的幸福与全面发展作为社会的终极目标。而社会发展的实践也证实了,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最广大人们利益的最大化,让人人得享幸福生活,人人感受快乐,才是名副其实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研究体现了这种社会对人的终极关怀,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在国际生活质量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我国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学习和借鉴国际上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研究的成果,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什么是小康社会的生活质量,有助于充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理论,更好地指导我国社会发展的实践。

[参 考 文 献]

- [1] 胡国清,等. 生活质量研究概述[J].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 2001, (2).

- [2] 王 威,陈 云. 欧洲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及其评价[J]. 江苏社会科学, 2002, (6).
- [3] 易松国. 生活质量研究进展综述[J]. 深圳大学学报, 1998, (3).
- [4] 周长城. 东南亚生活质量研究[J]. 国外社会科学, 2002, (6).
- [5] 周长城. 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建构中权重分配的国际视野[J]. 江海学刊, 2002, (1).
- [6] 周长城,饶 权. 政策层面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J]. 江苏社会科学, 2002, (1).
- [7] 周长城,等. 德国和瑞典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J]. 江苏社会科学, 2002, (1).
- [8] 周长城. 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9] Campbell, A. et al.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M].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6.
- [10] Diener. A Value Based Index for Measuring National Quality of Life[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5, 36.
- [11] Diener, Suh, Eunkook.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Economic, Social and Subjective Indicator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7.
- [12] Kau, A. K., Wang Siew Hooi. Assessing Quality of Life in Singapore: an Exploratory Study[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5, (35).
- [13] Robin, 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sures of Subjective and Economic Well-being: A New Look[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2.
- [12] Veenhoven, R. Why Social Policy Need Subjective Indicators[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

(责任编辑 于华东)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From Subjective Perspective

ZHOU Chang-cheng, CAI Jing-cheng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ZHOU Chang-cheng (1957-), male, Doctor,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economic sociology; CAI Jing-cheng (1980-), female, Graduate,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economic sociology.

Abstract: QOL indicators divided into objective indicators and subjective indicators. The subjective indicators of QOL which involved the happy feeling an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people, really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view of focus on people. 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dopted subjective indicators or build up their own structures to evaluate QOL in one nation or aera. America as an origin of QOL, own a leadership of this kind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Following with Europe nations and Asia already set a step to this study.

Key words: QOL (quality of life); subjective indicators; international level